

狂人变为疯子: *Igo funz di rhgi*、新文字和大众语

黄芷敏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 语言与文化系, 新西兰 但尼丁 9054)

摘要: 讨论三十年代拉丁化运动如何反拨传统的文学制度, 需要把书面语言纳入到现实生活的实践中。这展示了先锋派的书写意识。在此, 我们首先需要分析拉丁化运动为民间匿名大众整理的文法, 以及这个运动和当时大众语运动的关系, 阐释拉运者如何尝试改变当下的话语权分配。然后, 通过阅读鲁迅《狂人日记》的新文字翻译本 *Igo funz di rhgi*, 分析拉丁化运动在追求书面语言和大众口头语一致的时候, 如何反讽地整理和驯服了原文里“狂人”的语言。根据这两方面的分析, 可以深化讨论拉丁化运动内部的张力, 思考这个运动如何以大众启蒙之名, 发动文字符号的斗争, 延续了文字的权力。

关键词: 拉丁化运动; 新文字; 大众语运动; 鲁迅; 《狂人日记》; 白话文运动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38(2017)01-0019-10 DOI: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1.003

鲁迅在1918年于《新青年》发表的《狂人日记》, 通过小序与正文在书面语言方面的差异, 凸显传统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文学语言形式的层面上进行实验, 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自出版以来, 《狂人日记》已有很多解读。“吃人的礼教”一般被看作是一个隐喻[1](P.1042), 鲁迅借此批判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义道德”对人性的扭曲。“狂人”在小说中用以写日记的现代白话文, 因为在当时还没有成功超越文言文, 成为书面语言的正统, 所以狂人在故事中受到的压迫也可以用来隐喻白话文在当时的边缘位置。当时胡适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导者提倡以现代白话文取代传统文言文, 建立一个全新的书面语言制度。他们的激进思想, 对于固守传统的人来说, 也可以被隐喻为狂人的“狂”。可是, 《狂人日记》给出的一个悖论是, 如果“狂人”对儒家文化的阅读是出于一个精神心

理有问题的人, 那么作为“常人”的读者, 为何会读懂“狂人”的意思, 把他晦涩的、重复的和支离破碎的语言当作批评传统的隐喻来读? 王钦在《翻译的诱惑: 重读〈狂人日记〉》一文中指出, 因为隐喻已经建立了一个规范性的阅读法则, 所以过去和现在的读者不会从字面上理解狂人看来非常离谱的“人吃人”言论。读者往往只能通过一个翻译机制, 以“常人”的视觉, 或者说是小序里叙述者并日记编辑者的立场, 来把狂人“吃人”或“同类相食”(cannibalism)的说法翻译成隐喻, 即是把狂人的语言转化至某种意义框架和话语系统内部, 不论这个意义框架是由文言文还是由白话文支撑着。[2](P.55)

三十年代在中国推动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正是以“大众”的阶级立场, 来消解由文言文和白话文支撑的意义框架和话语系统, 建立一个全新的书面语言制度, 让“大众”由此成为话语建构的

收稿日期: 2016-11-16

作者简介: 黄芷敏(Lorraine Wong),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语言与文化系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华语文学、中国文字改革以及比较文学研究。

东西变得陌生化,自愿地挑战了传统的文学制度。[4](P.77,80)

本文承接 Hill 对《狂人日记》新文字翻译的分析,探讨拉丁化运动如何反拨传统的文学制度,展示他们先锋派的书写意识。Hill 认为拉运者的先锋意识,必须通过对新文字的翻译文本进行美学性的、文学性的分析才可以理解。可是,本文认为拉丁化运动所挑战的,是当时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据以界定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的价值体系。拉丁化运动把大众的政治和文化诉求写进语言制度,借以挑战用书面语言的手段来为价值体系编码的文化上的主人,进而割断文学制度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在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里, Peter Bürger 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出现的先锋派艺术工作者,如何挑战“作为制度的艺术”,反对资产阶级通过艺术生产和分配的种种设置而在社会上确立艺术自主性的概念。[5](P.22) 先锋派艺术工作者要重新把艺术纳入到现实生活的实践中,让艺术成为组织生活秩序的原则,并由此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产生陌生感,否定既有秩序的必然性,质疑资产阶级的权力结构和制度。[5](P.34) 拉丁化运动有着很相似的先锋意识,新文字做成的书写习惯的疏离感,并不是源于艺术的自主性。拉运者想改变当下的话语权分配和话语生产,使包括自己在内的汉字既得利益者,不再受惠于由汉字构筑的传统文学制度。如果我们要理解拉运者的先锋意识,便需要明白他们如何把书写活动和生活实践交织在一起。

王钦和 Hill 都提及到未来的时间维度。王钦认为,《狂人日记》作为现代主义的文本,否定当时的既定意义框架和话语系统,对无法预知的或者说是革命过后的新世界作出期许:“由这一否定过程所体现的正是‘启蒙’的弥赛亚主义式的承诺,一种对于无法预知的新世界的期待。”[2](P.62) Hill 也指出,《狂人日记》的新文字版本给出的是一个“将来完成式”的希望,以美学的形式表达了当时拉运者对未知将来的期许:如果新文字真的取代汉字的话,现代中国文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4](P.77) 不论是狂人混乱无序的

主人。怎样通过拉丁字母,为大众的口头语制作文字系统,让他们的口头语变成书面语言,并由此生产大众化文学,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核心问题。拉运者出版了相当多的教科书、读本、周刊和报纸,借以实验新文字的拼写法。拉运者在生产新文字读物的时候,往往依靠翻译现有汉字文本,而不是直接把大众嘴里所说的写成拉丁化新文字。在新文字的刊物上,除却用汉字写的介绍和宣传新文字的文章之外,一般都发表了用新文字写的新闻、短编故事、诗歌和歌曲。这些新文字文本,大部分都有汉字翻译在旁边对照。1936年,上海新文字书店出版了新文字版的鲁迅《狂人日记》,向读者推介这个版本“完全用口头语译出,读过一册新文字初级课本的人,就能够很容易读懂”。[3](P.25) 编辑王益和翻译史枕梅在词句上做了相当多的改动,使得新文字的译文比鲁迅文白交杂的原文更接近大众的口头语。^① Michael Gibbs Hill 在分析《狂人日记》的新文字翻译的时候,指出王益和史枕梅一方面在译文中保留了狂人在历史书上读到的“仁义道德”四个汉字,在旁边辅以新文字“rhen i dao de”,一方面却把狂人同样在历史书上读到的“吃人”翻译成新文字“chrhen”,而没有保留原来的汉字。[4](P.96) Hill 认为《狂人日记》的新文字翻译,不应当被看作是鲁迅原文的附庸品。由于拉丁化新文字不能有效表达文言文,因此翻译版的小序和正文都是用接近口头语的新文字写的,这就抹平了鲁迅原文里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张力。新文字版本的《狂人日记》却故意凸显了汉字和新文字的差异,创造另一个虚构的世界: fungz 所读到的书,本来就是用新文字写的,他也是在新文字的字里行间洞察到以文字构筑的历史害人不浅。Hill 认为,王益和史枕梅越过鲁迅原文的框框;新文字版的《狂人日记》是创新的作品,表达了当时拉运者的困境:他们竭力建立一个全新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系统,却没能完全摆脱汉字,新文字充满汉字的“余毒”。[4](P.96) Hill 指出,纵然拉丁化新文字本来以帮助文盲识字为目的,但实际上新文字的研究者、使用者和翻译者大都是会读写汉字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把拉丁化运动仅仅看作一个扫除文盲的运动。Hill 认为拉运者可以说是文艺的先锋派:以新文字取代汉字,就是故意把读书和书写从习惯的模式疏离开来。拉运者作为文艺的先锋,在于他们让熟悉的

①根据宋原放编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和陈玉堂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Michael Gibbs Hill 确认了王益等同王弦,而史枕梅则以 Chenmei 为其新文字译作的笔名。

日记文字,还是读者因为不熟新文字而要硬着头皮读的新文字文本,都可以被看作脱离了所指的表面意义的能指;它们松动能指和所指连结着的语言统一体,制造机会来生产新的意义,指向无法预知的未来。本文指出,虽然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当下,既定的话语系统和意义框架都需要被动摇,但是当语言和现实之间的沟壑和裂隙被打开了,需要重新寻找接合点和连结处的时候,这便需要文法把意义碎片连起来,更不可避免地对意义的传递和沟通有所期许。拉运者希望把书写文化这种传统上属于精英小众的东西的门槛拉低,把大众纳入书写文化里面。新文字打开了一个平台,让不太识字的大众与本来掌握汉字的小众可以同享陌生的书写和阅读经验,一道探索当下语言和现实的接合点和连结处,一起创造新的现实和社会关系。

拉运者虽然对未来有期许,但是这不等于他们无视当下对于意义传递和沟通的需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殖民斗争中,普通民众需要一种可以运转的、使用简单的书面语言,让他们了解当下的处境,并且在话语场域里反转劣势。毕竟书面语言不只是文学创作的媒介,它还是教育的媒介、政治宣传的媒介、社会现实的一环。本文首先分析三十年代的拉丁化运动如何设法为民间匿名大众整理文法,让他们可以参加到当时的话语场域里去。然后,本文将会讨论拉丁化运动和大众语运动的关系,解释在当时变动的社会中,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怎样以阶级的观点来重构。最后,我们通过阅读《狂人日记》的新文字版本,探讨拉丁化运动在追求书面语言和大众的口头语一致的时候,如何反讽地整理和驯服了原文里狂人的语言。我们由此思考新文字怎样以启蒙之名,延续了文字的权力。

一、属于大众的新文字文法

当拉丁化运动自前苏联进入中国后,这个运动不是在学校制度或者白话文学制度的环境内运作的。它主要为未受过教育或者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年人提供一种容易阅读和书写的拼音文字,使他们获得识字能力,由此知道一些此前所不知道的知识。虽然拉丁化运动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审查,但是新文字赢得了蔡元培、许地山、陈鹤琴和鲁迅等知识分子的支持。有些拉运者把比较有名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新文字,其他的则组

织新文字速成班,发表文章提倡或对新文字的拼写和文法提出意见。

拉丁化运动设法克服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差异,建立比白话文更接近大众的语言习惯和生活习惯的现代中国语文。作为拉丁化新文字的设计者和推动者,瞿秋白提出“文腔革命”,认为现代中国语文应该是通顺、精炼、广泛流通的语文。他把大众没有言语可用的状况,归结到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的不彻底:

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不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6](P.48)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中,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想法。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建立现代中国语文,使其有利于作家写出内容上和修辞上丰富的新文学作品,新文学作品反过来可以支撑这种新兴的中国语文。瞿秋白认为,自文学革命以来,胡适所想象的那个文学和国语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还没有成功地被建立。社会上还没有出现流畅通顺的中国语文,反而流转着各种混淆大众的文种,包括公文上用的文言文、欧化的新式白话文,以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旧式白话文。[7](P.30)

拉丁化运动不只是一个扫盲运动,它尝试从匿名大众的口头语里提炼出一种精密的书面语言,超越在当时流通着的文白交杂的语文。在晚清文字改革的浪潮中,为了向普通民众提供一种有利于他们以自己的口头语来掌握汉字读音和意义的方法,使教育制度能够更广泛地在全国设立,提升国人的文化水平,文字改革者设计了层出不穷的音标音谱,或者说是近乎速写的拼音字母,借以辅助民众读书识字。新文字跟晚清的文字改革方案不同,是因为它被看作为一个自足的文字系统来实验。怎样在意义上和句法上定下词儿的写法,是设计新文字拼写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词儿面目的时候,拉运者考虑到词儿的面目能不能反映大众

说话的习惯。新文字的文法是从大众说话的习惯延伸和发展的,这使得新文字不会被文化精英所垄断。

不表达四声音调是新文字力求使用简单的方法。在最初草拟的新文字拼音规则里,瞿秋白没有尝试在新文字里分辨每一个同音的汉字。他的方法不是为每一个汉字定下拼写法,而是把汉字看作字根,把它们连起来,制造多音节的字眼(词儿),通过上文下理来分辨它们的意思。新文字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在拼写法中表达同音不同调的字根,这些需要特别拼法的字根也不过是227个。比如说,“干”字在“你干不干”这一个句子里写作 ggan,而在“才干”和“能干”等用法里写作 caegan 和 nenggan。虽然是一个汉字的写法,但是 gan 和 ggan 分别指的是“做事情”和“本领”的意思。另一个同音字的例子是“想”和“像”。很多新字眼都是由“想”这个字根生出来的,例如 sesiaan(思想),siaanwan(想望),huan-siaan(幻想)等等。这些新字眼都有“思想”的意思,应该在拼写法上跟“像”分辨出来。[8](P.450)

新文字不是以汉字为单位,为每个汉字定下拼写法,表示它们的语音。瞿秋白认为,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字系统,没有很好地表达大众口头语里潜在的文法;新文字可以简单地整理和规定这些潜在的文法。比如说,在汉字的书写系统里,“子”、“儿”、“的”、“着”和“个”都是单独的一个汉字,它们的文法功能一直没有很好地被理解和表达。新文字把它们视为字尾,跟字根连在一起来写。这样做不但反映了大众说话的习惯,也更好地整理了这些字尾的文法功能:z 在 zoz(桌子)是名词的字尾;r 在 idienr(一点儿)是副词的字尾;d 在 dad(大的)是形容词的字尾;zh 在 kaezh(开着)表示进行中的时态;g 在 zeig(这个)和 nag(那个)表示指示代词的词类。[8](PP.453-454)一些经常使用到的字根,它的元音可以省略不写,例如“了”可以写作 l,如同以下的新文字句子:Ta dao l hueh mejou?(他到了会没有?)另外,h 在 hueh(会)里不表示语音,而是表示一个文法功能,指的是机关或者团体的名称。这样一来,gonhueh(工会)和 kaehueh(开会)的“会”就可以跟 hue-buhue(会不会)里的“会”分辨出来。[8](PP.454-455)

瞿秋白以上提出的拼写法原则,后来在拓牧(杜寿松)所编的《中国文字拉丁化全程》里得到进一步的阐释,拼写法从词类划分的角度得到更

细致的分析。在解释 o 和 uo 的拼写法的时候,拓牧说到 o 和 uo 两个语音在实际使用时很难严格地分别,为了方便大众使用起见,一般的情况写作 o:

o 因着它的简单,被采用了。uo 自然也被扬弃了。至于 uo 仍留存在 guo, shuo, xuo 等音段而指“特指”的意义,则是大众在实际使用中,一种科学的,合理的改良。因为这些字是常用的,有细分的必要。所以大众就不约而同的留下他们作周密的应用。……大众不光是文字的使用者,而且也是文字的改良者。只有大众的改良才合道理,才科学,才发生大的效力。[9](P.165)

拓牧同时鼓励新文字学生多看书报,多用新文字记账、写信、发表文章、写日记、写新文字墙报,并且教授别人。学习新文字的方法,主要是把一些汉字段落翻译成新文字,再把新文字段落翻译成汉字,通过这样反复来回翻译的方法来学习新文字的拼写法和词类分析。拓牧承认,要推广新文字,必需改变民众只愿意花时间学习得到官方承认的文字系统:“所以目前的新文字运动,一定要在民众自己的提倡、推广、建设之下,拿成绩来取得政府的相信,进而根据客观的需要,大众的要求,来正式颁布新法令。这一个宝贵的经验,应该作为当前新文字运动的指针”。[9](P.28)

Jacques Rancière 认为政治可以是关于如何划分谁拥有言语、谁没有言语。拥有言语的一群是有理性的,可以称为城市里的一员。言语里的逻各斯可以分辨什么是“申诉”的清晰表达、什么是“呻吟”的噪音。[10](P.2,23)拉运者在否定和消解以汉字为基础的传统书面语言和文学制度的时候,同时致力于建立新的文法框架,让新文字的使用者用以确定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无意义的,否则大众永远是发出噪音的一群,而不可能有言语。

二、作为政治力场的大众语

当拉丁化运动进入中国的时候,它跟在三十年代出现的大众语运动合流,两个运动同样追求大众写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11](P.216)针对当时国民党提倡复兴儒家传统和文言文制度,大众语运动的参与者陈望道、陈子展、鲁迅和曹聚仁等以大众为中心建立一个对抗的话语。“大众

语”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当时讨论的重点。正因为大众语的不在场,大众语的提倡者对大众语怀有乌托邦式的想法,希冀口语和书面语可以完全重叠。由于新文字不能清楚表达纯粹属书面语言的文言文,这便不难理解拉丁化运动和大众语运动的联合阵线。作为拉丁化运动的一员,胡绳在《新文字的理论 and 实践》一书里,把一段以前献给黄帝的挽联从文言文翻译成新文字:“Wei di i de rhu chun, liang i xo zhuan, gi gang gi ba, ging wei wan duan, diao min zhu ban cyan zh zhan, ing zheng zhao zhung gi zh zhu”^①[12](P.38)。胡绳用这个例子说明,要是新文字真的通行起来,文言文很难继续在社会运转。相比起20年前的白话文运动,拉丁化运动以一个更彻底的方法,试图解除文言文对书面语言的支配。

在1910年代末期,胡适和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挑战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的制度,另外确立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作为新的书面语言的正宗,并据此建立国语文学。白话文在当时被认定为新鲜活泼的文学书写媒介,它的“口语特质”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被肯定的;白话文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问题来讨论,反倒被转移到文学制度的内部来研究。白话文运动变成了怎样从以往的通俗文学里寻找国语文学的种子的问题。[13](P.83)拉运者和大众语论者认为白话文运动让文学生产的问题掩盖了一直没有解决的国民识字的问题,白话文有成为新的文言文的嫌疑。作为大众语运动的旗手,陈望道对大众语有这样的看法:

用大众语写文字的态度必自认是大众的一员,不在大众之上,也不在大众之下。这与写文言文和通俗的白话文的态度都不同。在这里我们可以决定大众语和文言文与白话文内容方面主要的关系。据我看来,文言文、通俗的白话文和大众语三种不同的文体,根柢上实是三种不同的态度:文言文是反大众的,通俗的白话文是混大众的,而大众语却是即大众的。……假使可以说大部的文言文学史是站在大众外面反大众而自以为正经高贵的文学史,那么可以说通俗的白话文学史便是站在大众外面混大众而自以为不正经不

高贵的文学史。[11](P.219)

大众语论者把作家从文学制度的内部移向广大的社会,让他们跟大众站在同一立场来写作。要是作家真的放弃汉字而学习新文字,他们便能够从汉字既得利益者的身份中释放出来。这样一来,作家不再以同情老百姓的态度,在文学作品里描写引车卖浆者的生活,而是进入新文字的书写世界,跟大众一道学习新文字,一道使用这个书写工具来生产新的意义。

大众语的倡议者没有从语言学上为大众语定下精密的意义,他们的讨论却涉及到如何认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匿名大众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经历,说着不同的方言,他们怎么可以被所谓的大众语联系在一起?在大众语的讨论中,姜琦提出的观点,比较精确地解释了所谓大众语,不是一个实质存在的语言,而是一个连结语言和现实的政治力场。陈望道等大众语提倡者所说的大众写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在姜琦看来,只不过是大众语的性质,还没有点明大众语指的是什么。姜琦说道:

如果我们要站在唯物论的立场,那么,我们应该认定社会意识是为语言所决定的,并非是语言为社会意识所决定的。但是要注意的,语言这个东西,还不是社会意识之最后的决定要素;至于社会意识之最后的决定要素,当然是属于人类生活;语言呢,它不过是代表人类生活之一种工具而已。[14](P.17)

姜琦认为,“统一的生活”是“统一的语言”的基础,[14](P.18)也是大众语出现的条件:

社会上一切设施,并非有些专为劳心者而设施的,有些专为劳力者而设施的,即认定前者是闲暇阶级,后者是劳动阶级;然而我们必须认定无论劳心者或劳力者都有享受闲暇与操作劳动之权利与义务,时刻地去谋这两者之沟通与统一。不过在另一方面讲,劳心者与劳力者虽同是操作劳动之人,但是前者是属于脑筋劳动居多,后者是属于筋肉

①这段挽联的原文:“维帝一德如春,两仪合撰,纪纲极八,经纬万端,吊民着板泉之战,膺愆昭中冀之诛。”胡绳:《新文字的理论 and 实践》,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38页。

劳动居多,因此,这两者的举动,态度乃至语言等等就发生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就要问“大众语”的建设,究竟以何者的语言为标准呢?……“大众语”的标准不能偏重于任何一方面,而是折衷地立于上述的这两者之中间取出他们所能共通了解之语言去组织的。由此,可见所谓“大众语”并不是代表某阶级——劳心者或劳力者——之语言,而无论劳心者或劳力者所能共通了解之语言。[14](P.21)

姜琦承认能够沟通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大众语还没有形成。如果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重新调整,使得“劳心者”和“劳力者”在日常生活上有共同的平台,那么大众语便会慢慢地出现。姜琦所指的联系“劳心者”和“劳力者”的“统一的生活”,不是指他们生活上的单一化和标准化,而是指这两个阶级有共同的权利,可以享用包括语言在内的社会资源。姜琦认为大众语不是反映或者带来劳心者和劳力者统一的意思;他强调大众语应该是能够表述这两个阶级之间“共通的社会意识”。[14](P.1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姜琦用“通”字而不是“同”字来表达他所指的共享的社会意识。这揭示大众语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以特定的语法、语音和词汇来定义的语言,反而是一种变动的、以语言为中介的政治力场,有不同生活经验的人群可以通过这个政治力场来沟通和表达各自的经历。“通”也含有开放的、不断变化的、历史生成的意思,凸显了姜琦所指的大众语不是一个静止的、早已经存在的语言。

如果我们看看大众语讨论中其他的一些观点,便能够清晰地理解姜琦的观点的独特之处。周作人把大众语的问题看成是一个手段,把庞杂的普通民众的语言写进文学作品里:

以前绅士们关了门做文章,把引车卖浆之徒推出去,这是我们所反对的,觉得不足为法;现在这班“之徒”擂鼓似地打门,打了几年,把这扇牢门总算打开了,那么这问题也就解决,大家只要开着门去做文章便好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

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理论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言语倘若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15](P.8)

俞平伯从方言文学的角度来看大众语的问题:“文学的描写如不要逼真则已;如要逼真,不得不采用方言以求逼真。”[15](P.8)胡适从国语和方言的关系来理解大众语:“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只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那部分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15](P.9)孙伏园把方言文学跟拼音文字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字因为有衍形的来历,在汉字如此通行的局面下发展方言文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5](P.10)周作人、俞平伯、胡适和孙伏园等学者的意见,是以“北方学者对于大众语各问题的意见”为标题,在1934年第一卷第四期的《社会生活》上发表。当中不难发现,他们对大众语问题的看法,是以边缘和中心、方言和国语在地域上的关系为前提的:他们把大众语看作语言的最低共同点。虽然姜琦提到大众语应该是劳心者和劳力者的语言的折衷,可是他并不是简单地把大众语看成是语言的最低共同点,而是通过工具论来把“大众”、“语言”和“现实”联系起来。他说道:“语言这个东西,还不是社会意识之最后的决定要素;至于社会意识之最后的决定要素,当然是属于人类生活;语言呢,它不过是代表人类生活之一种工具。”[14](P.17)作为工具,语言的作用是反映现实;而在这个被反映的现实里面,语言这个工具已经交织在里面。作为现实的一环,语言可以改变社会意识。相比“北方学者”的观点,姜琦以阶级的角度来看大众语。大众语不是被动地反映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现实:不同的阶级身处同一个现实里,语言是跟这个现实交织在一起的,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可以独占或专有这个现实和这个语言。所谓大众语,其实是一个政治力场,在其中,普通民众主动地梳理语言、常识和对世界感知的方式。

三、狂人变为疯子:《狂人日记》的新文字翻译

要让大众拥有言语,并使他们的言语成为能够发挥作用的话语,改变不平等的现状,新文字

文本必需能够作为“文”跟其他的“文”抗衡和斗争,后者可以是用汉字写的传统文言文,或是同样用汉字写的现代白话文。鲁迅《狂人日记》的新文字翻译可以让我们理解文的斗争。《狂人日记》这个篇名,在新文字版本被翻译成 *Igo fungz di rhgi*,即《一个疯子的日记》。这样一来,“狂人”变成了“fungz”(疯子)。唐小兵在研究《狂人日记》和中国现代主义的关系时指出,相比起“疯”字,“狂”字有更长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诗经》以及《论语》,意义涵盖面更广。鲁迅的《狂人日记》本来仰仗俄国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周作人把果戈里版本的书名翻译成《疯人日记》,很明显是要凸显果戈里笔下的“疯子”和鲁迅笔下的“狂人”的差异。[16](P.1226)果戈里的“疯子”波普里希钦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办公室小职员,整天幻想自己可以胜过沙俄帝制下享有特权的贵族,他的身份意识是依附着当时沙俄官僚社会对阶级的划分。纵然波普里希钦表达了他对当下社会制度的腐朽、虚伪和丑恶的不满,以及他对特权阶级的嫉妒和愤怒,但是他没有试图使自己成为话语场中的主人,颠覆不公平的专制制度。波普里希钦最后能做的,只是微弱地向他妈妈诉冤,哀求她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17](P.473)正如唐小兵所分析,鲁迅的“狂人”故意违背传统的道德和准绳,越过既定社会制度加之于他的界限。他有一股再生和爆发的力量,使制度化了的意义秩序瓦解,也使意义生产的过程不断跃动和变化,并由此重新创造价值。[16](P.1226)相比之下,“疯子”指的是精神错乱、失常、没有察觉能力的人。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分析了文明如何把“疯癫”这个现象说成是非自然的病态,并且对怀有这种现象的特征的人群加以压迫。那就是说,“疯癫”本身不是自然的病态,而是文明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界定,它是文明生成的产物。[18](PP.74-75,221-228)王益和史枕梅把“狂人”改成“fungz”,这固然是因为“疯”是一个比“狂”更新又更接近大众口头语的字;他们同时加上量词“igo”(一个)和助词“di”(的),使得故事的篇名可以变作一个短语并以更合乎文法的方式表达意思。这样一来,王益和史枕梅变成了小序里叙述者的同谋,作为日记预设的第一读者来驯服狂人的话语。

阐释者一般认为《狂人日记》有两个反讽的地方,[19](P.71)并据此来对这个文本进行解构性

的阅读。第一个反讽是狂人最后康复并“赴某地候补矣”。[20](P.18)狂人基于进化论而对传统作出批判,最后却只能返回到小序里以文言文支撑的“常人”的世界,重新认定既定的意义秩序和价值系统。第二个反讽是狂人在日记最后“救救孩子”的呼喊。这个呼喊不能跟日记的其他内容连贯起来,它只可以是语无伦次的喊叫,凸显小序里的叙述者对狂人以及他所相信的进化论的蔑视和讽刺。[2](P.60)新文字翻译本的《狂人日记》去掉原文里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差异,以及这个差异引申出来的叙述者和狂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上两个反讽的效果在新文字版本被减弱了。新文字版本却显示了另外一个反讽:王益和史枕梅以大众之名而采用的新文字,比原文的小序更彻底地收服了狂人的言语。

在原文里,小序的叙述者告诉我们“狂人日记”这个书名,是“本人愈后所题,不复以改也”。[20](P.20)为什么狂人坚持“狂人”这个名目?他已经从“迫害狂”这个病中康复过来,没有理由坚持以往挑战传统的想法。或者说日记是属于过去的,无论当时的他如何奋不顾身地颠覆传统中国的生活世界,现在的他已经回到这个世界的“常规”中来。我们不要忘记,小序的叙述者告诉我们狂人为日记命名,“狂人日记”不是叙述者选择的篇名。这也可以说叙述者故意使自己跟“狂”这个概念划清界限,显示他坚持中国传统的价值,反对任何价值重塑。我们也不要忘记,鲁迅不同于小序的叙述者,他以“狂人日记”做故事的篇名,使在篇名中出现的“狂”和在日记中出现的“疯”对比起来,显示狂人不甘于被“常规”或者是福柯所指的“疯癫”的框框所定义。在第十节里,原文写道:

这时候,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将来吃了,不但太平无事,怕还会有人见情。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正是这方法。这是他们的老谱! [20](P.46)

新文字的版本是这样的:

Zhe shxou, wo iu dungde tamndi izhung fazliao. Tamn budan bu keng gai, rcie zaoji ybeixaola, wo sh igo fungz! Zi-anlai gei tamn chdiaoliao, budan xen taiping, kungpa xuan iou rhen iao siesie

tamn-ni. Langzcun dagia shuo sh chidia-ola igo orhen, ziu sh zhe igo fangfa. Zhe sh tamndi lao faz!

(这时候,我又懂得他们的一种法子。他们不但不肯改,而且早已预备好了,我是一个疯子!将来给他们吃掉了,不但很太平,恐怕还有人要谢谢他们呢。狼子村大家说是吃掉了一个人,就是这一个方法。这是他们的老法子。)[3](P.20)

原文里清楚地指出,狂人把“疯子”看作强加于他的一个“名目”。他把日记命名为“狂人日记”,表达了他有意识地拒绝常规对他的定义,肯定自我超越与价值创造。[16](P.1226)可是,在新文字版本里,“fungz”自言自语地感叹说“wo sh igo fungz”,神经兮兮地重复大哥和村民对他的看法。Fungz 没有替日记命名而宣告自己“狂人”的身份,他缺乏“狂人”在鲁迅原文里所显示的自我意识。相反地,fungz 跟果戈里笔下的波普里希钦倒有几分相像,他们两人都没有勇气大胆地揭露社会的丑恶,最后只能无奈又无助地屈服于当下腐朽和虚伪的社会。

在第十节里,狂人把线性的历史叙述切割成碎片,混淆了不同历史阶段里有关“吃人”的人物:“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了,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20](PP.42-44)这凸显了狂人支离破碎的语言,也表达了他把线性的历史叙述撕开,让意义和价值有被重构的机会。在新文字版本里,王益和史枕梅把这一段省略掉了。易牙、桀纣和徐锡林属于不同的历史时空,民间匿名大众在他们的日常用语里一般不会提到这些人物。不要说把这些人物写进新文字版本会使引车卖浆的读者摸不着头脑,就是把这一段保留在新文字版本里也需要另外加上注释,就像王益和史枕梅在前文里为 baoxuang(报荒)加注一样。[3](P.5)这些注释会加重大众在阅读上的负担。狂人通过引用历史上“吃人”的真实例子而坚持“吃人”的字面意义,抵抗上文王钦说到的隐喻意义。新文字版本对这一个部分的省略,去除了狂人抗争的面向。此外,在新文字版本里,叙述者跟 fungz 在语

气和表达上没有什么不同。叙述者告诉我们“shu d mingz, na sh ta zgi bing xaola ixou giaksiakydi, ie ziu bu gailiao”(书的名字,那是他自己病好了以后加下去的,也就不改了)。Igo fungz di rhgi 抹掉了在《狂人日记》里鲁迅、叙述者、狂人纠缠在一起而又互相抗拒的声音。王益和史枕梅与小序的叙述者共谋,一同整理狂人具颠覆性的语言。

新文字的拼写法在句法和意义表达上,尽量贴近大众的口头语,以大众为中心建立新的书面语言制度,借以重组话语场域。新文字的拼写法希望能让大众作出清通而平实的表述,使他们以“文”为手段跟当时的文化支配者斗争。拉丁化运动把希望寄托在意义沟通和表达上,使大众在话语场中反转劣势。这种对沟通和表达的相信,正是鲁迅在《狂人日记》所质疑的。狂人精神分裂的状态和支离破碎的语言,不但表达了文言文和白话文在沟通上形成的缺口,也表达了在一般意义上沟通的无效性。新文字版本为了使文字浅白,让大众读得明白,把鲁迅原文里半文半白的表述,整理成合乎新文字拼写法和文法的表述,纵然这些拼写法和文法在当时还在被实验的过程中,也不是真的能够让人一看就明白。上文提到 Hill 的分析,他指出 fungz 是在新文字的字里行间认识到以文字建构的历史对个人的压迫,所以“吃人”必需要用“chrhen”来表达。Hill 也指出,当时拉运者竭力建立一个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系统,但是他们不能完全摆脱汉字,在研究和实验新文字的拼写法的时候,他们往往要把汉字翻译成新文字,新文字充满汉字的“余毒”。[4](P.96)

本文认为,与其说新文字充满汉字的余毒,不如说自晚清以来包括拉丁化运动在内的文字改革一直延续着“文”的权力。这些改革希望用拼音字母消除汉字加之于中国语文的那种绘画似的、图解似的负担。文字改革者由汉字体系转到拼音文字体系,从一种意义生产的规范(汉字的法则)转移到另一种意义生产的规范(拼音文字的法则),认同“文”相比起口语更加能够发挥启蒙的力量。正如刘禾指出,中文和日文同样以“文明”表达“civilization”这个概念。[21](P.375)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相信人类可以通过文字系统、书面语言和文本来启迪思想,认为文字可以帮助人类脱离野蛮状态,建立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进行精神上的追求。此外,文字因为能够克服时间和

空间上的距离，记录和保留信息和意义，因此它往往是权力实践的手段；无论是巩固既有的权力结构还是颠覆当下的制度，拥护传统的意义还是生产新的意义，文字都是必需的中介。Fungz 成为这两种文字的权力所争竞的对象，一种是保守性的，另一种是革命性的，这解释了他精神分裂的状态。Fungz 说：“Wo fanzheng shuibuzho giao, ziu zsidii kanla bango wanshang, cai cung zhe limian kanchulai, zhe shangmian cyan du siezho igo cr: ‘chrhen’！（我反正睡不着觉，就仔细地看了半个晚上，才从这里面看出来，这上面全都写着一个词：‘吃人’！）”[3](P.7) 我们可以用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所分析的“文明”对“疯癫”的界定，来理解 fungz 在这里的揭示：无论是汉字还是新文字，都是文明生成的产物。文字因启蒙之名而生的权力，投注在人类的身体上；这种权力通过标记和组织人类的身体而使之配合当下的制度对理性和非理性、正常和病态的界定。[18](PP.74-75,221-228) Fungz 的身体成为被文明铭刻的表面，他的健康状况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政治塑造。Fungz 诉诸接近大众口头语的新文字来抵抗四千年保守的传统，可是他未必不会行使文字的权力，把其他人当作铭刻的表面：“4000nian ilia, changchang chrhendi difang, gintian cai mingbai, wo ie zai limian xunla xydo nian. (四千年以来，常常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里面混了许多年。)”[3](P.23) 那就是说，fungz 不见得不会以革命之名而 chrhen。Fungz 被文字和文明劫为人质，不管这里面牵涉的是汉字还是新文字，传统儒家文明还是现代西方的文明。

四、结语

拉运者一方面消解传统的文言文制度，挑战刚建立的现代白话文制度；另一方面他们整理和规定文法，使新文字文本的文理清通，可以作为“文”跟其他的“文”抗衡和斗争。作为新兴的书面语言，新文字整理和驯服不能被大众所理解的语言。虽然新文字延续书面语言一贯的支配权力，可是它跟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抗争，把植根在汉字里根深蒂固的意义松动起来，使意义生产变成可变动的过程，让文字符号和现实生活可以有重新被编织在一起的机会。当文言文和白话文维持的意义秩序被拉丁化运动动摇了之后，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沟壑和裂缝。当大众能够掌握书

写语言并据此在话语场中参与意义生产的时候，他们同时帮助寻找这些缝隙的接合点和连结处，借以生产能够改变不平等现状的新的意义。

大众的言语需要“文”的内在规定。新文字建立新的文法框架，由此让大众在话语场域里以平等的姿态改变意义秩序和社会现实。可是，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把大众用言语表达的政治诉求铭刻进既定的社会制度里，帮助大众在一个言说共同体里砍出属于他们的各个不同的主体位置。本文分析的“文”，不只是文法和言语的规范；“文”也是一种“铭刻”或“砍出”的政治：政治的铭刻不是半心半意地掺入和包容大众因为缺乏政治意识而发出的“噪音”。政治的铭刻有关于话语场域和社会制度的置换，以及意义秩序的重构，使大众的诉求能够伸延到各种社会和政治生活里，刻画出不一样的社会形态。[22](P.810) 那就是说“铭刻”是一种政治塑造，也是一种政治斗争。

《狂人日记》和 *Igo fungz di rhgi* 告诉我们，根据进化论来为中国文化介绍现代化的出路，不论是狂人相信的人道主义，还是 fungz 使用的拉丁化拼音文字，都潜藏着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其他国家和文化进行侵略和征服的危险。当民间匿名大众通过使用新文字来颠覆传统的文化支配者，质疑后者的普遍性论述，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时候，他们可能以另一种普遍性的论述来加强自身的正当性，伸张自己的权力，竭力使自己的普遍性论述成为永世长存的“铭刻”。如果中国盲目相信“现代化”和“进步”等观念，并据此来壮大自己，她很可能被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用普世价值的名义操纵，被吸引着去把自己普遍化，竭力使自己成为普世价值的铭刻。新文字没有取代汉字，却让我们认识到文字符号的斗争，一种铭刻的政治。

参考文献：

- [1] Eva Shan Chou. "Learning to Read Lu Xun, 1918-1923: The Emergence of a Reader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172(2002).
- [2] 王钦：《翻译的诱惑：重读〈狂人日记〉》，《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6期。
- [3] 鲁迅：《*Igo fungz di rhgi*》，王益编，史枕梅译，上海：新文字书店，1936年。
- [4] Michael Gibbs Hills. "New Script and a New 'Madman's Dia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7, no. 1 (2015).

- [5] Peter Bürger.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Trans. Michael Sha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6] 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散文》下,文木、郁华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 [7]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散文》下,文木、郁华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 [8] 瞿秋白:《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 [9] 拓牧:《中国文字拉丁化全程》,上海:生活书店,1939年。
- [10] 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Julie Ro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 [11] 陈望道:《大众语论》,《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
- [12] 胡绳:《新文字的理论 and 实践》,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
- [13]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4] 姜琦:《我对于所谓大众语的几个意见》,《社会生活》,1934年 第1卷第4期。
- [15] 俞平伯等:《北方学者对于大众语各问题的意见》,《社会生活》,1934年第1卷第4期。
- [16] 唐小兵:“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and a Chinese Modernism.” *PMLA*, 5(1999).
- [17] Nikolai Gogol. “Diary of a Madman.” in *The Collected Plays and Tales of Nikolai Gogol*. edited by Leonard J. K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4.
- [18]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5.
- [19] 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0] 鲁迅:《狂人日记》,《呐喊》,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年。
- [21] Lydia Liu. “Scripts in Motion: Writing as Imperial Technology, Past and Present.” *PMLA*, 2(2015).
- [22] Aletta J. Norval. “‘Writing a Name in the Sky’: Rancière, Cavell,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galitarian Inscrip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2012).

Cannibalized Man Changes into Madman: *Igo fungz di rhgi*, New Writing and Mass Language

Lorraine Wo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Otago, Dunedin 9054, New Zealand 9054)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Lati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1930s, with the specific focus on the ways in which this campaign articulates an avant-gardist consciousness of writing by incorporating writing into the praxis of life. The first part of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how the Latinization Movement was aligned with the Mass Language Movement in giving ordinary folk the right to writing. The second part looks at the translation of Lu Xun’s *Diary of a Madman* into the Latinized script and in doing so examines how the latinized version of this story has eliminated the subversive power of Lu Xun’s “madman”. Ultimatel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Latinization Movement as well as its engagement with the power of writing.

Key words: The Latinization Movement; New Writing; the Mass Language Movement; Lu Xun; *Diary of the Madman*;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责任编辑:吴 芳)